革命文化教学要关注四“性”

——以统编高中语文教材为例

江苏 张洪安

摘要：高中语文课程在继承和弘扬革命文化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和作用，但如何在语文课程及其教学视域下落实革命文化教育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语文学科革命文化教学除了要关注革命性和文化性这两个固有特性外，还要从内容题材、主题思想、学习目标、文化传承等维度特别关注女性、人性、审美性和传承性。

关键词：革命文化教学；女性；人性；审美性；传承性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以下简称“新课标”）明确指出高中语文课程在“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和作用，而其中的“革命文化”是语文课程文化建设的新取向和新要求。新课标在选择性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中分别设置了“中国革命传统作品研习”“中国革命传统作品专题研讨”两个学习任务群，旨在将革命文化提升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等重要的地位。所谓“革命文化”，一般是指“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领导中国人民，在激励中华儿女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争取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各个时期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形成的，凝聚中国精神、汇集中国力量、展现中国风格的文化形态”[1]。可以说，革命文化不仅丰富了中华文化的表现形态，而且发展了中华文化的思想谱系，进而成为思想教育或文化教育的一个重要维度。因此，在语文课程中渗透与学习革命文化，既是对语文教育文化价值导向的澄清，也是对语文教育以文化人功能的确认。那么，作为一线教师究竟应该如何在语文课程及其教学视域下开展革命文化教学呢？对此，笔者结合统编高中语文教材中的相关选文，从文本解读的角度分析，认为语文学科革命文化教学，除了要关注革命性和文化性之外，还要关注以下四“性”。图片

1

革命文化教学要关注“女性”

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反映中国妇女由愚昧到觉醒再到抗争的历史。可以说，革命文化的积淀与妇女解放运动密不可分。而统编高中语文教材中的革命文学作品，是承载和落实革命文化教学的主要抓手，其中有不少篇目就是围绕中国妇女形象来书写的。她们虽然隐藏于文字背后，默默无声，但却生动诠释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妇女的众生相。如《包身工》中奴隶一般的“芦柴棒”与小福子，《记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记念》中为中国而死的知识青年刘和珍与冯铿，《小二黑结婚》中大胆追求自由恋爱的小芹与利用迷信骗人钱财的三仙姑，《荷花淀》中积极支持丈夫参军的水生嫂，《党费》中为保护同志而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黄新……所以，切勿忽视革命文化中的“女性世界”或“女性力量”，它应成为文本解读的重要内容取向。此外，这些个性化的女性形象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生存于群体中的个体，是群像中的个像。如《包身工》采取点面结合的手法来写，“芦柴棒”与小福子是个像，而包身工整体是群像；《荷花淀》不仅仅写水生嫂，还写了她周围的几个妇女；《党费》亦是如此。

从文本解读的角度看，统编高中语文教材中的革命文学作品在塑造女性形象时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力求将人物放在情节演进中动态地予以展示，使其完成性格的蜕变。比如《百合花》中的新媳妇，是典型的个像人物，被小通讯员舍生忘死的献身精神感召，由在异性面前忸怩不安，转变到一针一针地为牺牲的小通讯员缝补衣肩上的那个破洞；由借被子时的心有犹豫，转变到将新被子铺盖在牺牲的小通讯员身上。再比如《荷花淀》中的“水生嫂们”，是典型的群像人物，她们经过一场遭遇战的洗礼，最终成长为保家卫国的战士。此外，考察革命文学作品中女性的觉醒与转变，还要注意人物的身份及其生活的特定时代。如《党费》中的黄新，是1931年入党，丈夫卢进勇又是红军，她生活在土地革命战争的低潮时期，随时会被叛徒出卖，久经血与火的考验，自然要比新媳妇和水生嫂显得更为成熟与机警。基于以上认识，在进行教学设计及其实践转化时，不仅要通过整体感知、文本细读等，引领学生切实体会革命文学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还要通过情境化任务，进一步调动学生探讨的欲望，将其与现代女性进行比较，从而挖掘和提炼出不同时代女性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品质。图片

2

革命文化教学要关注“人性”

如果说“女性”是对革命文学作品的内容题材维度的考量，那么“人性”就是对革命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维度的考量。因为革命文化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伟大实践的产物，所以它理应内含人性的本真和闪耀人性的光辉。换言之，优秀的革命文学作品不能以阶级性扼杀人性，要充分体现人性的关怀，展示人性的力量。如《记念刘和珍君》中有一段充满情感色彩的语言：“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作者并不是完全站在阶级的立场控诉段祺瑞执政府的暴行，而是从人性的高度予以愤怒的谴责，充满悲天悯人的情怀。再比如《包身工》的作者将“包身工”这种饲养小姑娘营利的制度与船户养墨鸭捕鱼的故事相比较，从而更有力地刻画出包身工所遭受的野蛮压榨与残酷迫害。显然，这是站在人性的立场，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帮凶的兽性进行道德的审判。可以说，对人性的追问和审思是革命文学作品的特征和底色。

从文本解读的角度看，其实，作家们在一些革命者身上，会有意地适时张扬人性的特征，使人物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比如黄新是一个光辉的女共产党员的形象，然而作家王愿坚并未将其刻画成“高大全”式的完美人物。她不让自己才五岁的妞儿抓腌制的豆角吃，文中借程同志的话语对她进行了批评：“看了这情景，我只觉得鼻子尖一酸一酸的，再也憋不住了，就敲了门进去。一进门我就说：‘阿嫂，你这就不对了，要卖嘛，自己的孩子吃根菜也算不了啥，别屈了孩子！’”黄新是一个革命者，可她也是一位母亲，不能因为革命而苦了年幼的孩子，那就违背了革命的初衷。“停了一会儿，她侧耳听了听外面的动静，又说话了，只是声音又变得那么和善了：‘孩子，要是你能带，也托你带上山去，或者带到外地去养着，将来咱们的红军打回来，把她交给卢进勇同志。’”借助托孤行为，这位女革命者完成了母性的救赎。用鲁迅的话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革命性与人性不应水火不容，而应交相辉映。因此，在解读文本时，一方面要充分了解革命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革命色彩，另一方面要透过外在的形象深入人物的内心，捕捉他们身上最朴素、最真实却又相当隐忍的情感。要知道，刚毅并不能遮蔽革命者的柔软，二者刚柔相济，相得益彰。基于以上认识，在进行教学设计及其实践转化时，就需要重点把握两点：第一，在文本释义（理解文本的基本内容）的基础上，想要解码革命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既需要从文本内容的表面挖掘他的革命性，更需要从个性化语言的背后挖掘他的人性；只有理解了人物的人性，才能更好地把握人物的革命性。第二，通过问题引领（如“革命时期，人身上的什么品质最重要”）或任务驱动（如“当你面临小家和国家必舍其一的两难困境时，你会怎么办”），让学生能够结合自我阅历和真实感受评鉴革命文学作品想要表达的主题思想，从而加深学生对革命的反思和对人性的思考。图片

3

革命文化教学要关注“审美性”

相较于内容题材维度和主题思想维度的考量，“审美性”主要是针对学习目标的考量。虽然“革命文化方面的课文，思想性很强，但不可重道而轻文，把阅读课当成思政课”[2]。换言之，革命文化教学不能仅固守文本的革命性和思想性，进而让语文课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课。语文课程是融通语言、思维、审美和文化四要素于一体的综合性和实践性课程，尤其统编高中语文教材所收录的都是文质兼美的作品，应通过其审美性更好地发挥语文学科陶冶情操的育人功能。革命文学作品感情纯正浓郁，具有极强的感染力，要让学生领略作品的美，做到以情动人。比如吟诵《沁园春·长沙》，要领略伟人以天下为己任的青春豪情；涵泳《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要感受到鲁迅先生对为中国而死的革命青年的哀悼之情和对反动势力的痛恨之感；欣赏《百合花》，应滋润于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深情；品读《包身工》，应油然而生对帝国主义反动派及其走狗的无比仇恨。可以说，革命文学作品的感情基调总体是昂扬的，能激起普通民众的革命豪情。有的作品感情基调虽有点悲凉，但并不消沉，让人心怀希望。如《记念刘和珍君》的结尾：“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又如《为了忘却的记念》的结尾：“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这些结尾都平添了亮色，表现出对未来必胜的信念。而《小二黑结婚》《荷花淀》等，色调更加明朗，洋溢根据地人民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从文本解读的角度看，革命文化教学的审美性，重在品析革命文学作品的语言美感。梳理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可以发现，被收录的革命文学作品体裁多样，有通讯报道、报告文学、杂文，还有诗歌、散文与小说等，它们在表达创新上各有所长，让读者在享受语言美感的同时，能够潜移默化地受到革命文化思想的熏陶。通讯报道《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事例典型，通过人物生动的语言刻画形象，以言见人。《百合花》没有正面描写战争场面，而是抓住小通讯员、刚过门三天的农村新媳妇和文工团员“我”之间的小的“纠葛”来写，把一个流血牺牲的战斗故事，写得自然清新、优美柔和，茅盾曾夸赞《百合花》表现庄严主题，“除了常见的慷慨激昂的笔调，还可以有其他的风格”[3]。《小二黑结婚》与《荷花淀》，一属“山药蛋派”，富有泥土气息，一属“荷花淀派”，充满诗情画意。二者风格迥异，可以引导学生作比较阅读，体味文学语言的多样化。基于以上认识，在进行教学设计及其实践转化时，一方面要依凭文本语言，尤其是反映人物形象的个性化语言或揭示主题思想的关键性语句、体现表达风格的特征性语句，需要对之着重揣摩和反复研读，以便有效地提升学生的语言感知力；另一方面要有针对性地设计一些思辨性问题和富有挑战性的鉴赏性任务，以便有效地训练学生的语言审美力。图片

四、革命文化教学要关注“传承性”

无论是对题材的考量，还是对主题的考量，抑或是对学习目标的考量，都不能将革命文化孤立地来进行认识和教学。有研究者强调，“革命文化一方面继承和丰盈了中华文化的历史脉络，成为中华文化思想体系中的一种重要表现形态；另一方面它又体现和弘扬了中华文化的现世价值，成为中华文化思想宝库中的一种极其重要的资源”[4]。从中不难发现，革命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一脉相承性，它们两者虽然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其产生源头和价值追求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换言之，革命文化无法脱离传统文化，而是根植于传统文化之中。但就革命文化教学而言，“这里确有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即后起的‘革命文化’和我们老祖宗独创的‘传统文化’能不能更紧密地衔接起来，更和谐地加以贯通”[5]。以《荷花淀》为例，“你走，我不拦你。家里怎么办？”“你明白家里的难处就好了”……正因为这些女子们爱家爱亲人，深深懂得有国才有家，才会深明大义、义无反顾地送丈夫到战场上去。水生的父亲也对水生说：“水生，你干的是光荣事情，我不拦你，你放心走吧。” 家国情怀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自古有之，它已渗透到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血脉之中，成为民族的精神支柱。革命者以及普通民众，深受五千年中华文化的浸润，身上不可能不打上传统的烙印。又如水生嘱咐水生嫂最重要的一句：“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们拼命。”这不单纯是贞节的问题，而是体现了中华民族抵御外辱、宁死不屈的高贵人格。还有前文提及的“水生嫂们”冒着生命风险去看自己的丈夫，更是传承了中华女子贤淑忠贞的美德。

当然，传统文化中也有保守的东西，比如“男女有别”思想，但并不损害革命者形象，反而使得人物塑造真实可信。如《为了忘却的记念》中的柔石，“他的迂渐渐的改变起来，终于也敢和女性的同乡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离，却至少总有三四尺的。这方法很不好，有时我在路上遇见他，只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后或左右有一个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会疑心就是他的朋友”。这种“迂”让柔石的革命形象变得可亲可爱。《百合花》中的小通讯员与“我”和新媳妇，因“男女有别”而产生了种种冲突，但我们不仅不认为人物思想封建，反而觉得军民之间就像“百合花”一样感情纯真。可见，对于一些不合革命潮流的传统方式，要持理性批判态度。鲁迅先生对“徒手请愿”的斗争手段就并不苟同：“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至于一些封建糟粕，与革命文化格格不入，则应受到贬斥与抛弃。正如《小二黑结婚》的结尾以戏谑的方式嘲讽三仙姑与二诸葛：“淘气的孩子们去听窗，学会了这两句话，就给两位神仙加了新外号：三仙姑叫‘前世姻缘’，二诸葛叫‘命相不对’。”

基于以上认识，在进行教学设计及其实践转化时，就既要引导学生分析革命人物身上勇于突围、无畏生死的革命一面，也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他们与身俱来的传统的一面，进而将革命性与传统性有机地融嵌于人物形象及其性格的解读活动之中。此外，在研判和揭示革命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时，也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是从历史的角度去把握主题思想的时代性和典型性，另一方面是从当下的角度去把握主题思想的借鉴性和启发性。图片

综上，从内容题材角度看，革命文化教学要关注女性群体，从解放妇女的立场感受革命的艰辛与伟大；从主题思想角度看，革命文化教学在彰显革命性的同时，不能忽视永恒的人性；从学习目标角度看，革命文化教学的思想性与审美性同等重要，要蕴思于言、寓教于美；从文化传承角度看，革命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难以割裂，革命文化教学应兼具革命性与传统性的双重品质。革命文化教学只有兼顾这四“性”，才能在文本解读上做到充分理解与深刻把握，进而才能在教学实践中做到有的放矢和有效落实。

参考文献：

[1] 王晓丽，王俊飞.改革开放 40 年来关于革命文化概念、价值、 发展的研究[J].湖北社会科学,2018(7).

[2]崔峦.革命文化方面的教材与教学[J].七彩语文，2021(7).

[3]茅盾.茅盾评论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4]刘飞.论语文统编教材中的革命题材选文及其教学[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2021(4).

[5]刘锡庆.关于中学语文教改的若干思考[J].课程·教材·教法，1999(3).